

张旭东 ● 著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WAY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WAY

张旭东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张旭东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169-9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1219 号

特约编辑 朱 康
责任编辑 薛 羽
封面装帧 汪 昊

本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

张旭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25 插页 4 字数 400,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169-9/D·2714

定价 68.00 元

序言

辑录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多不是穿靴戴帽的论文，而是面向公众（或“想象的公众”）的论辩性、论战性文字。在今天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环境里，学者越出专业研究的范围去谈论公共性话题是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很容易落入各种陷阱和俗套，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诱惑。明知危险而仍甘受诱惑，想来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对 80 年代乃至整个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追忆与向往；二是一些根本性问题或话题从来就不能被限制在专业学科的框架里。这些问题多年来在头脑里追逐萦绕，像交响乐里深沉的低音部，给自己的读书思考奠定了情感的、存在的基调。上海人民出版社薛羽先生建议把这些散落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汇集在一处，给我自己提供一个整理思路的机会，这是令我珍惜而感激的。

二十六篇文章时间跨度为十二年（2002—2014），大致围绕以下几个事由或议题：

一是 2002 年暑期北大讲课内容修订后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的历史批判》为题出版。从上课期间的一次访谈（后用作全书的代序）到 2006 年在台湾《思想》杂志上对批评的回应，一组文章初步展开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认同、文化政治、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的讨论。几篇文字虽都从那书说开去，但对应或回应的却是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知识思想场域里的基本问题，包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在西方普世主义话语和价值体系的凌厉攻势下如何为当代中国的集体实践和意义创造做出有效的说明和辩护、如何分析西方在价值领域里表述和构建自身历史经验的连续性与合法性，如何在此基础上为当

代中国文化政治表述提供经验和方法上的参照，等等。

本书中发表较早的几篇都在两个意义上延续了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知识思想讨论的议题和思维习惯。比如它们继承了 80 年代青年知识界以西学讨论（特别是对西学经典作品及核心思想和理论的深入讨论）的方式介入、思考中国问题，在现代性普遍矛盾中把握传统和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实质。比如书中第二部分“从‘中国道路’到‘中国梦’”的两个附录，分别是讨论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与内格里、哈特合著《帝国》的座谈纪要。这种思路贯穿全书。同时，这些篇目也都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方式涉及或卷入了 90 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学界的分裂和论争：比如“学术与思想”之争、“中学西学”之争、“理论”与“实证”之争、“激进与保守”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等等。

之所以说是“以自己的方式”，是指这些篇目都是从自己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角度介入立场之争或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它们用心和用力的焦点，则始终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性、自觉；是当代中国集体实践在意义创造和意义阐释上的创造性和自我肯定的意愿与能力。这些问题之所以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当然是日益增长的中国经济实力、社会活力、文化自信和自我意识同冷战后全球化国际环境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强势压迫正面碰撞的结果。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论争仍然是世界性的问题与矛盾在一个半封闭社会空间里的折射与回声，那么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已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性历史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前沿与核心地带。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灵感、希望和梦想，也越来越显出作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验的深刻意义。能为这样的史诗性经验提供什么样的描写、叙述、意义阐释和道德辩护，则是今天中国的读书人肩负的最高的使命，也是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正是这个历史形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制度正当性、意义生产和解释框架、价值系统带来的持续的压力，构成自己多年来在日常教学研究之外的关注点，也自然成为这些年来接受公共媒体访谈时讨论的主要内容。不过应该说，到 2007 年为止，这种讨论都是不自觉的、以《全球

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005年第一版;2006年修订第二版)的“余墨”或“通俗说明”方式出现的。

2008年奥运圣火接力在西方所受的阻击、汶川大地震以及随后的抗震救灾活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一系列事件,则是这个集子形成过程中的外部转折点。可以说,以2008年为契机,我自己越来越自觉地参与到有关中国认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的思考和讨论中去。这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在2009年随着一系列纪念和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动而达到一个高潮。可以说,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这两年间写下的这类文字,而此后的文章是这两年间思考的逻辑发展。《文化自觉片论:启蒙主义的政治危机与伦理危机》开始对这些问题的历史性回溯和思想史反思,而作于本书结稿前仅仅两周时间的《主权者——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观察者网访谈)则以纪念这位伟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方式,继续了对人民共和国历史起源和价值根基的思考。

围绕这条主线,本书还有包含另外两个相关但带有半自律性的议题:一是由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用制度改革所引发的有关中国大学的价值定位的讨论。从这个问题延伸出去,又写了几篇文章,讨论文化民族主义、海外留学生的学术使命和政治自觉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经典阅读等话题。

最后一部分和我自己的老本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有关,虽然有文章分析王安忆和莫言这两位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但总体上说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因为它们的关注点是新中国文化经验和文学表述的内在的历史实质、精神强度和价值基础,与本书其他部分的文章遥相呼应。

既然面对公众或“想象的公众”言谈和写作,就要准备好虚心接受来自公众的批评、批判和挑战。但在截稿之际略感遗憾的是,自己迄今仍不能说找到了或掌握了一种适合这种交流与讨论的足够通畅显白的文字和文风。如果有读者关心书中讨论的问题却受挫于文字的艰深晦涩,我需要事先在这里表达自己真诚的遗憾和歉意。

本书章节多篇首发于《21 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借此机会向该刊的编辑记者，特别是张翔先生致谢。另有几篇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暑期座谈会或讲习班记录基础上整理而成，在此对组织和参加这些活动的同事和同学们，特别是我华师大批评理论中心的同事罗岗教授致谢。其他各篇分别首发在《现代中文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报》、观察者网和《社会观察》杂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新华传媒“知本读书会”、《文化纵横》杂志、《文汇报》“文汇讲堂”系列、《学术月刊》、《开放时代》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我们时代的写作》，在此一并致谢。在本书的编辑整理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朱康先生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薛羽先生出力甚多，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5 年 6 月 29 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部分 人民共和国根基的再确认

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 / 3

试谈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 / 14

主权者——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 29

附文 两个“六十年”座谈会整理稿 / 47

第二部分 从“中国道路”到“中国梦”

普遍性与中国道路——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问 / 85

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性 / 94

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谈梦想的历史时刻 / 109

附文一 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

——重访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理论 / 146

附文二 普遍性和文化政治

——从《帝国》出版九年后的再评价谈起 / 190

第三部分 文化主体与文化自觉

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 213

中国文化的根源是今天的中国人 / 223

文化主体性的辩证法与历史决定 / 236

文化自觉片论：启蒙主义的政治危机与伦理危机 / 247

第四部分 世界主义与中国认同

文化、政治与竞技——2008 北京奥运会观感 / 275

在中国，本土不是地域概念 / 282

全球化图景下的中国认同 / 287

在新的矛盾统一体中确立价值认同 / 296

第五部分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

文化民族主义、“挫折感”与中国学人的精神使命 / 307

中国：走出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瓶颈 / 317

文化认同与学者的使命

——梁任公《敬告留学生诸君》百年有感 / 335

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 / 345

第六部分 新中国文学经验的当代性与历史性

在“当代性与文学史”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 / 361

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答记者问 / 374

“启蒙”的精神现象学

——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 379

作为历史遗忘之载体的生命和土地

——解读莫言的《生死疲劳》 / 401

附文 莫言是通向当代中国文学的门户 / 423

第一部分

人民共和国根基的再确认

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

一、五四主流话语的困境

长期以来，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总体上没有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关键词所划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固然处于所有关于五四的思想讨论的核心，但如果不把它放在更大的理论语境里做开放性的理解，关于五四的主流话语和知识范型就势必逐渐过度地域化和僵化，从而沦于被各种外围和边缘话语包围、修正乃至颠覆的被动状态。无论80年代后期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讨论，还是90年代以来用所谓“晚清现代性”来模糊和消解五四的划时代意义的努力，都是以五四主流话语和知识类型自身的僵化为突破口，从而借助更大的知识语境和问题关联域，将五四的主流论述视为单一的、狭隘的政治化论述，进而通过历史主义逻辑（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的时间顺序）或学科专业化、实证化路径，把五四精神架空或淹没在貌似“多元”和“众声喧哗”的杂多性里面，最终以打破五四、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压抑”为名，打通和排除“前革命”（晚清、民国）与“后革命”（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全球化、“普世价值”等等）之间的历史障碍，在历史书写的层面上冲淡或干脆抹掉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的集体记忆和当代切关性。

所有这些当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力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并以学院政治和学科政治的方式展开。五四论述，不过是新一轮全球性文化权

^{*}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并以“只有五四才能帮助中国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为题的演讲稿发表于人民网·理论频道，2009年5月4日。

力和意义争夺中的一个局部性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生活中，却带有极为重要而关键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过去九十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面理解和评价，从而同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未来指向息息相关。

二、“五四精神”的两个核心构成

“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这些当然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看，它们仅仅是代表了“五四精神”主观的、甚至是一厢情愿的方面或价值取向。在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把五四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我们就应该看到，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两样东西：

一是“新”——“新青年”、“新文化”、新价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国”，这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内在化了，变成中国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从五四开始，外在的（相当程度上是外来的）、有威胁性的、让人觉得不自在、但又不得不去适应的“新”，逐渐成为内在的、作为内心驱动力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新。这种内在化过程的激烈和深入，彻底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的分裂，即王国维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①，从而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同现代人的情感、心理、理想，乃至欲望方式紧闭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当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这是现代人和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古代人或遗老遗少的问题。

二是文化政治的逻辑，即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带来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的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国族主义”或“民族国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欧美，这个普遍趋向表现为市民阶级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统一市场、统一语言、统一制度、统

^① 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一的“民族文化”，这个过程造就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而在中国，这个过程是在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挽救传统的极为严酷的环境下展开的，因此它也对文化与政治的贯通和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则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作为历史/文化整体或总体的五四，标志着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合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始。

近代欧洲的发展，在其最内在的精神强度和丰富性上，包含着这样一个双重的运动，即随着现代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生产、交流、管理和自我再现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日益被政治穿透（首先是、最终还是市民阶级的“存在的斗争”，包括其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利的革命、起义、立法、行政、战争、内战、言论、宣传等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成为后者的表象、意义生产和价值自我辩护的“符号的生产活动”；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正因为其贯穿一切社会领域和社会阶层，也在超越了传统的统治术的、政治哲学的高度，日益成为文化政治，即那种以捍卫和发展市民阶级自己的生活方式为目的，为本阶级作价值上的辩护、从事意义和表象生产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象征行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主流民族主义理论（如 Ernest Gellner）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国族主义）定义为对“文化和政体之重合与一致性”^①的历史诉求，并把现代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定义为这种诉求的实际结果。必须指出，这种源自现代欧洲的国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建设，本身是现代性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相互贯通、相互激发的结果。启蒙、大革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新兴印刷媒体和公共讨论的出现，新型全民教育体制，无不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下，提出了“文

^①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14.

化”与“政治”之间的重合（convergence）与一致（identity）的问题，并在一个高度压缩了的时空范围里，在观念上完成了“现代中国”的奠基。从五四开始，中国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因为（1）它再次把自己视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的统一体；（2）这个“文化”不再仅仅是传统，而是被现代“存在的政治”所规定的“新文化”；（3）这个“新文化”直达个人，直达灵魂和个体意识的核心，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个人变成一种“普遍的媒介”，即变成现代社会的一个积极的分子和创造性、构成性元素，即新的政治，特别是新的国家形态的材料。

这个双重运动，在西方主要民族国家形式的确定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以此成为西方主宰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意志和合法性辩护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大致完成，“资产阶级法权”和文化价值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转向了进一步把文化和政治的辩证法，发展为关于自身历史主体性的“文化政治”的自我教育、自我伸张、自我普遍化的过程。我们至今仍然目睹这一过程的延续和变更，如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主权概念向超国家、基于所谓“人权”和“普遍性”的世界主权乃至“世界内政”概念的转变。

三、“新”之历史本体论：从新文化到新人、新价值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中，才能凸显它惊人的历史意义，即在“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则一步步地后退”（竹内好）^①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救亡图存”（这继承了晚清的“保教”或“救国保种”的意识）而把存在的政治带入文化；通过“启蒙”（民主与科学，白话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而把文化带入政治，即通过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国民性改造，再造作为社会存在和政治存在的中国。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之间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始终是分离的，即“国”（乃至“姓”）与“天下”的分离；政治理性（从御侮、洋务，到变法和废科举）

^① 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6页。

同文化理性（“西体中用”、“国粹”）的分离；集体存在的政治同个体存在的政治的分离；也就是说，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只能在不触动旧中国的根本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并自圆其说。五四所标志的纪元性转变，正在于以它为起点，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同文化革命完全打成一体，反之亦然：任何文化思想观念形式的变革，也完全同生产方式领域的变革密切相关，作为其再现、表象和自我表达被生产出来。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回归”本位，即文化与政体的重合和一致，不过在帝国形态下，这种重合与一致是事实上的、实质性的；而在“新文化”的形态下，这种重合与一致是想象的、观念性的、唯意志论的。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激进变革和历史的“精神运动”的源头，不是其他历史事件能相提并论的。尽管五四运动带有明确的反传统和“偶像破坏”倾向，尽管它的“科学、民主”和“个体精神”的启蒙意识形态在今天面临必要的历史的再认识，但它重新把作为政治存在的中国置于一个普遍性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从五四开始，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存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复兴，才真正开始，而原因正在于，从五四开始，作为“新文化”的主体的新人，才成为现代中国的精神实质和政治实质，这个集体性的“新的个体”作为一种政治性的自我意识，在自我与他人、普遍与特殊、同一性与差异性、总体性与多元论的辩证冲突之中，在国家的自我确证的形式中展开——这是一个“新”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New）为中国社会形态、政治形态和表象领域的自我理解提供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时代，我们今天仍处于这个时代的“初级阶段”。

五四的伟大和不可代替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完成了近代西方通过数百年激变才完成的人本主义“世俗化”和“内在性”的转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五四运动的全部含义不过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重复了近代西方主权概念的自我确立过程，即为它找到“人民”（国民）和“精神”（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解决方案，即把神的主权转化为世俗国家的主权，再以人民主权的概念将这一过程合法化。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把获得新的精神自由和政治可能

性的个人和群体纳入到国家、人民和民族主义的形而上学神话和现代性权利系统中去，从而去“克服”现代性内部的“自由”与“秩序”的结构性矛盾；而是通过政治意识的空前高涨和尖锐化，通过政治热情和政治动员，特别是对国家和文化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国内尚未在根本上被触动的旧制度的双重抵抗和突破，不断地把一种新人、新的个体性、内在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生产出来，并把这种新人的内在规定和外在生活方式作为“新文化”确立为现代中国的精神实质和政治诉求。换句话说，五四运动包含了现代中国的起源的秘密：人民不是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填充物和形式合法性的修辞，而是现代国家赖以形成的实质和它的全部目的，这个目的和实质就其内在的精神规定来说是新文化，就其外的存在来说就是新人——新的人民必须由新文化生产出来，当人民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毋宁说是在创造一个新国家，即那种新文化的政治上的、制度上的实现或现实化。这种看似最为激进的国家形态，却又最合乎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国家观念，即国家立足于文化，文化领域为政治领域提供能动因素和道德实质；而国家政治，不过是文化政治的延伸、形式化或礼仪化。因此五四标志着这样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在此，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观运动，在中国人的世界里突破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而在人的心理、情感、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这样的内部空间，获得了鲜明的形象、语言、观念和理论。一旦它同一种新的“人”的概念相结合，则一般的抽象的“新”和“变”就不仅仅只是被动的、不情愿的适应和被迫，而晚清以来中国一切变化和变革都只有这样的意义，因为在情感、内心和符号层面，必须做的事情却又是外在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五四带来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从此，中国人不再仅仅作为普遍历史的客体，而是作为它的主体和创造者，在塑造自己的新的文化认同的同时，塑造着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五四运动同中国现代性和革命的内在关联和同构性，即来自于它这种在现代性固有矛盾的外壳中不断地生成新的、创造性、反抗性、颠覆性的意志和内在性，并通过这种新的情感能量和政治能量本身的“文化化”要求而不断地建设和修改现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界定国家的历史实质。